

# 双循环、分工整合与经济增长

黄玖立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摘要:**双循环提供了各地区和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分工与市场整合的激励,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利用世界银行 WITS 数据和中国加入 WTO 后关税的变化,从空间的角度回顾了双循环、分工整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与国内贸易成本决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各地区与企业参与双循环的程度,双循环彼此融入,共同塑造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市场整合格局,双循环依存互动,影响了企业的行为与绩效,也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市场机会、要素与技术;长期来看,国内循环是主体,是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重要依托,而深度贸易自由化是实现双循环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双循环;贸易成本;区域市场整合;深度贸易自由化;跨国公司;国际循环

**中图分类号:**F124;F7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1)01-0057-12

## Dual circulation, specialization &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UANG Jiuli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s' Studies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Dual circulation provides the incentive for various regions and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pecializ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impetus of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WITS and the changes of tariffs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l circulation, division of labor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a spatial point of view. Existing research finds that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domestic trade cost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various regions and enterprises in China

收稿日期:2020-11-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73072)

作者简介:黄玖立(1973-),男,河南光山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participating in dual circula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wo economic circulations are integrated into each other, which together shape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 The mutual relia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circulations affect the behaviors and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and also provide the market opportunities, factors and technology needed by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run, domestic circulation is the focus and foundation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while in-depth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path to achiev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Key words:** dual circulation; trade cost; reg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in-depth trade liberalizati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经济学中的循环是对稀缺资源在不同市场间流动周转的形象说法,涉及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等“一连串”经济活动。站在一国的立场上,国内循环(或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或外循环)分别对应着不同空间范围与权利集合内的资源流转。与其他提法相比较——双循环的概念框架包容性更高、理论张力更强,能够提供直达问题核心的、具有全局性视角的解决方案,也为许多经济学科领域提供了参与国家政策讨论的机会。

双循环既是关于现实中经济运行模式的写照,也是达成总体战略目标的“帕累托改进”式路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受亚洲“四小龙”发展的启示以及为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的初衷,国家在沿海多个地区兴建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加工贸易。这种贸易形式具有“两头在外”的显著特征,既能够有效利用剩余要素,减轻国内物资匮乏和资本短缺的压力,又可以避免对传统体制形成直接负面冲击。然而,国际循环的进程既然已经开启,内外循环之间的交互作用或相互“咬合”就是迟早的事了。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参与国际循环后打破了低效率的封闭内循环体系,为体制转轨与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有形的稀缺资源与市场机会,也提供了无形的机制示范和竞争压力,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续写了东亚经济的增长奇迹。

然而,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过分依赖国际循环的发展格局难以为继,从而到

了必须调整的历史关口。从国内条件看,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环境规划标准逐年提高,中国制造业基于廉价要素投入的比较优势已所剩无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甚至中国本土企业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撤出中国,转移至工资水平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从国际环境看,由于中国经济崛起、贸易收支不平衡和意识形态差异,个别发达国家国内鼓吹与中国“脱钩”的声音甚嚣尘上。发达国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再工业化”或工业振兴计划必将带来部分制造业回流。在这一国内国际背景下,“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面对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改变中国经济过去长期依赖外循环的发展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谋求一个有较大回旋空间的“基本盘”、较稳定的动力源泉与较友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触及了双循环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产品市场和劳动力迁移、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然而,双循环的核心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其重点工作任务是消除区域间各种阻碍商品流通和要素流动的有形和无形壁垒,充分发挥中国超大经济体的规模优势,构建依托于国内需求之上的产业分工或价值链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最高决策层在“双循环”提出不久之后旋即又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改革的原因<sup>①</sup>。

<sup>①</sup> 此即“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详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十四五”开好局》,202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第1版。

中国是一个大空间尺度的国家,区域是国内需求和产业分工的空间载体,区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激励的着力点与国家治理政策“抓手”所在,区域问题能够充分折射制约国内国际循环的各种因素。简言之,空间维度的问题或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我们解读“双循环”内涵需要面对的首要分析对象。鉴于此,本文着重从区域市场整合或区域间分工协作的维度讨论双循环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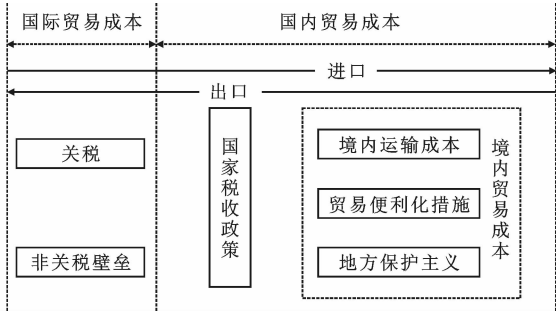


图 1 贸易成本构成

往较低而进口则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税收制度安排以及与之配套的中间商组织,也可能起源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国内地区间的贸易成本不对称性则可能来自双边贸易结构上的差异,如 A 地输往 B 地的产品主要是价值量较高工业制成品,B 地输往 A 地主要是质量较高、价值量较低从而运费占比较高的初级产品。第三,空间异质性。贸易成本的高低取决于企业(地区)的空间特征、运输路线、运输方式以及贸易伙伴的地理区位。第四,行业异质性。行业贸易成本往往与产品属性(运费对产品价值的比例)、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产业政策以及聚集等产业空间分布形态有关。

(二) 贸易自由化与国际循环参与

从关税水平看,随着多边与双边贸易自由化不断加速,中国的国际贸易成本不断下降,对外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这促使中国企业加速融入国际循环。根据世界银行 WITS 数据(图 2,其中 1995 年缺),1992 年中国 4 920 种 HS6 分位产品进口关税的简单平均值为 40.07%,加入 WTO 前的 2001 年迅速降至 15.9%,2005 年之后进一步降至约束关税之下(约 9.8%),此后基本保持稳定。降低关税不仅能够促进进口,而且能够促进出口,其中最终品关税减让促进了中国最终产品进口,但中间品和资本品关税降低则显著促进了生产链下游产品的出口金额与出口产品质量<sup>[2]</sup>。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且尚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下游,进口高质量中间零部件与机器设备能够突破国内本土供应商与技术水平的局限,显著促进企业的生产

一、贸易成本与内外循环畅通

畅通性是内外循环的基本要求。影响循环畅通性的因素既包括关于市场准入、经营许可等主体资格限制措施,也包括各种阻碍产品与要素流动的成本,如地理距离、山川江河等天然屏障,以及显性或隐性的人为或政策性壁垒。从贸易流量的角度,所有的壁垒因素均可转换为贸易成本,它既影响了内外循环本身的效率,也决定了内外循环之间的相互融入或“咬合”程度。

(一) 贸易成本基本构成

畅通循环要求尽可能地降低阻碍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商品贸易的壁垒。根据 James et al.<sup>[1]</sup>的研究,广义上的贸易成本是指将货物从厂商运送至最终消费者的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既包括运输成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跨国情形)等容易识别的成本,也包括信息沟通、契约执行、货币兑换以及物流配送等所需的支出。概括起来,影响国内循环的成本是区域间贸易成本,主要是指与地理区位对应的运输费用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显性和隐性壁垒;影响国际循环的贸易成本既包括商品在企业与港口间发生的成本,也包括因商品跨越国境而发生的“国际贸易成本”,即国家层面的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相关财税支出(图 1)。

贸易成本具有 4 点特征。第一,来源多样化。所有影响商品到岸价(出厂价)和消费者最终购买价格(离岸价)之间差距的因素,均是贸易成本的来源。第二,不对称性。出口环节对应的贸易成本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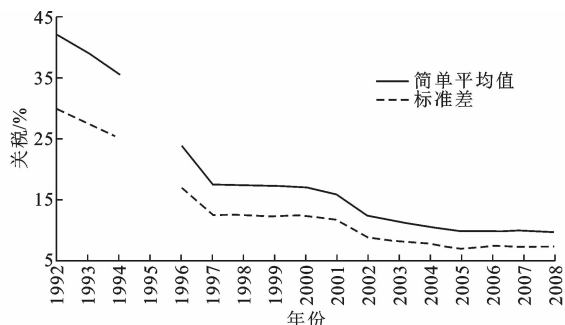


图2 1992~2008年进口关税的简单平均值与标准差

能力与出口倾向,从而促进国内产业参与国际循环的力度。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进口关税之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也是影响中国融入国际循环的重要环节。以企业进出口权限为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贸易经营权掌握在国有大型贸易公司手中。改革开放后直至加入 WTO 前,为了防止国际循环造成的冲击,对外贸易经营权仅对少数民营企业开放,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许可无法直接接触国际市场,只能通过贸易公司间接进行进出口贸易。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推进,传统的贸易体制不断发展。2004 年即加入 WTO 后的第 3 年,中国兑现加入 WTO 的承诺,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将原来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对外贸易经营权的解禁,为众多民营企业开放了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机会,从此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必囿于国内循环,也不再受中间商的“挤压”。根据中国海关进出口企业数据库,2001 年有出口和进口记录的民营企业分别只有 3 916 家与 2 072 家(包括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两种口径),2002 年迅速增至 10 060 家与 5 696 家,2004 年进一步增至 39 654 与 20 834 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外贸易经营权放开的意义并不亚于进口关税减让,它直接从主体经营资格的角度消除了横亘在内外循环之间的制度壁垒<sup>①</sup>。

在对外贸易经营权放开、关税减让等多重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中国的国际贸易成本持续降低,贸易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根据测算,改革开放后中国与 G7 各国以“关税等价”衡量的双边贸易成本持

续下降,其中 2006 年相对 1980 年下降幅度高达 30%,并且这一趋势在加入 WTO 后不断加速<sup>[3]</sup>。这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然而,总体上看,当时中国制造业的单边进口开放度和出口开放度还比较低,且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开放度也比较低<sup>[4]</sup>。这也表明,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潜力还很大。

### (三) 国内贸易成本与内外循环

#### 1. 国内贸易成本的来源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由于地理区位以及财税体制,各地区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即境内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其他地区的贸易成本(即区域间贸易成本)各不相同。第一,道路通行费和燃油费等费用支出是对外贸易的境内运输费用与区域间贸易成本的主要来源。区域间运输成本主要取决于地理距离,但“过路费”“过桥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财税关系扭曲的产物。在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状况下,道路通行费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此外,运输成本部分取决于道路基础设施和物流系统建设,如是否通铁路和高速公路、是否有保证生鲜消费品供应的冷链系统等。第二,国内贸易成本也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源自地方利益的保护主义行为是经济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产物,也与辖区之间的晋升竞争激励有关,它不仅分割了市场,而且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契约环境<sup>[5]</sup>,提高了包括进口产品在内的外来产品的销售成本。地方保护主义形式多样,既包括区域间的排他性贸易壁垒,也包括政府采购中的本地偏向。第三,以加强通关信息披露和简化通关程序为主要内容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企业进出口的重要基础设施<sup>②</sup>。中国海关散布在中国各地,其机构运行效率和人员

① 正如亲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所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下子放开了经营权,中国几十万个企业一下子拿到了外贸经营权……中国的外贸出口差不多以每年 30% 的速度连续增长了十年。”参见和讯财经的新闻报道, <http://news.hexun.com/2018-10-16/194846639.html>。

② 事实上,包括贸易便利化在内的营商环境建设是目前中国各地自贸区“政策试验”的重要内容。

素质各不相同,从而形成各个地区境内贸易成本差异的来源,而中间商组织和贸易金融服务也影响了地区间贸易与各地融入国际循环的程度。

## 2. 境内贸易成本与各地区的国际循环参与

境内贸易成本是制约内陆地区融入国际循环的重要壁垒。经验研究发现,以距离沿海港口远近刻画的境内运输成本显著地制约着地区出口贸易流量,这种制约作用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产品-国家数目)尤其是产品数目的影响实现的,对集约边际即平均出口金额的影响并不明显<sup>[6]</sup>。当然,境内贸易成本将随着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而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国内交通条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尤其是那些与国道主干线相连或距离较近地区的企业<sup>[7]</sup>。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对外贸易的境内贸易成本仍然较高。经验研究显示,对外贸易的国内距离相当于35~95倍的国际距离,而且没有表现出明显一致的减弱趋势<sup>[8]</sup>。这也意味着,境内贸易成本仍然是制约中国各地区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融入国际循环的重要因素,也是后续深化对外开放的政策重点。

## 3. 区域内贸易成本与国内循环模式

从空间角度来看,左右资源要素循环流动的基本力量有两种,即向心力与离心力,前者是企业 and 居民为了节省运输成本和利用规模经济的“扎堆”倾向,后者是要素价格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逃离”倾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运输成本,同时降低要素流动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从而重塑国内循环的模式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面貌。

从微观企业的角度,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节约企业的要素投入成本与产品销售成本,但不同类型的交通运输方式对企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中铁路客运能够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从而有助于企业用劳动替代资本和中间投入,但其货运对要素投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公路客运提供的规模效应提高了企业要素投入,但其货运减少了可变要素投入<sup>[9]</sup>。从单个城市看,公路和铁路建设能够引导居

民和企业转向郊区,使得城市中的经济活动分布趋向分散<sup>[10]</sup>。从区域整体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初期会提高城市间的人口与要素集中趋势,使得边缘城市的工业经济在“虹吸效应”作用下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sup>[11]</sup>,但随着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大,要素价格上升,人口与资源将会向外辐射扩散,这就是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形成过程。

国内地区间的地方保护行为类似国际贸易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是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产业和就业的手段。由于排他性的行政干预是中央明令禁止的,许多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转向地下,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如本地产品采购补贴)存在着,但这种保护主义根植于财税制度,十分顽强。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区域间贸易成本使得那些产出利税率和国有企业比重高倾向分布在依赖政府干预较强的省区<sup>[12]</sup>,这显然有悖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是造成地区间产业同构的重要原因。在某些情形下,地方保护也可能是源于地区间的税收协调失灵,如增值税出口退税制度要求企业向出口地政府申请退税,但后者显然并不愿意承担异地采购投入品部分的退税责任,这限制了地区间的分工协作<sup>[13]</sup>。

# 二、内外循环融合与区域间的分工整合

从区域的角度,内外循环相互融合是一个在时间轴上渐次展开的过程,呈现明显的空间梯度分布特征。这一过程既取决于地理区位,也是内生于地理区位的开放战略与外商投资选择叠加作用的结果。区域偏向的区域开放战略与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转移叠加在一起,使得沿海地区能够凭借廉价劳动力迅速融入国际循环。

## (一) 内循环的外向转型:内生的区域开放战略

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不仅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多个深水良港,拥有国际海运贸易所需的先天便利条件,距离国际市场“更近”,而且靠近日本和东

亚“四小龙”，具有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地理优势。在决策者一端，在资金和外汇等资源极度稀缺、内循环日益“吃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殊的地理地形构造使得东部和南部沿海成为融入国际循环的首要选择，也使得随后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这一基本地理区位特征。

第一，国家的区域开放政策和制度安排偏向沿海地区，是这些地区迅速融入国际循环的重要原因。以“解除管制”和吸引外资为核心内容的贸易和投资促进政策多偏向中国沿海<sup>[14]</sup>，其中各类“经济特区”通过特殊政策安排，在转型经济中营造了产业发展所需的局部契约制度环境<sup>[15]</sup>，使得沿海地区能够规避大环境的不足。不仅如此，各种税收优惠和产业导向政策也大多有利于沿海地区，是这些地区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催化剂与助推器。

第二，根据国家的总体部署，东部率先放弃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转而按照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循环<sup>[16]</sup>。与此相对照，中西部地区距离国际市场较远，从而也就距离这种增量意义上的技术、资金和市场机会较远，价值链也相对独立和封闭，经济运行仍然以国内循环为主。通过制度示范与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国际循环影响着国内循环的运行模式，促使沿海地区思考传统体制的弊病，率先进行改革和转型。沿海地区的改革和市场转型又进一步使得这一地区拥有更加优越的制度环境，经过多轮次“对外开放－国内改革”的累积循环，东部地区在国际循环上的比较优势地位得以逐渐巩固<sup>[17]</sup>。

## （二）外循环的内向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 FDI 流入

跨国公司是全球范围内经营的企业，是全球价值链与外循环的主导者。外资企业是跨国公司（国外资本）在中国国内投资新建的企业，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内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发生联系，因而也是横跨中外两个市场、沟通内外两大循环的关键主体。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沿海地区能够节约运输成

本，有东道国在关税、通关和外汇等方面的专门安排，又有大量亟待就业机会的高素质劳动力，能够接续低成本的价格优势，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平台”型企业直接投资的当然选择。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阻碍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壁垒不断下降，运输手段和通讯技术的改善又带来国际贸易成本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产品内分工或外包成为可能，这就是新兴的价值链贸易。在这一全球分工模式中，传统意义上的产品界限被打破，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的生产可以借助不同经济体的资源优势，从而使得各个经济体凭借自身优势完成不同的工序和环节，形成整体“合力”。

现实中，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循环将中国沿海地区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但是未直接“惠及”内陆地区，从而形成沿海和内地间在参与国际循环上存在差异，以及地区间的分工相对割裂状态，也是新型专业化分工本质使然。2000 年之后的全球分工格局可简要概括为“大三角”贸易，其中中国从日、韩等地净进口中间产品，向美欧为主的世界其他国家净出口最终产品<sup>①</sup>。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角度看，由中国的子公司承接的价值链部分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环节）或贴牌生产，附加值和国内技术含量不够高，需要多次穿越国境，对交易成本敏感，因而较少延伸到内陆地区。此外，内外循环之间的嵌套模式也受政策影响。为了防止内循环受到冲击，国家通过政策措施降低了国外循环的影响，自然也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内陆地区可能的溢出效应，将外循环的影响局限在沿海特定区域。

## （三）内外循环驱动下的区域分工与整合

内外循环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等多个层面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重塑了中国各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这种影响体现在产业分布、区域内贸易、周期协同与价值链等多个方面。

① 美国和欧盟从中国净进口最终产品，同时向日、韩等地提供基础研究和专利技术，以及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日、韩等地的跨国公司则向中国提供中间产品如零部件和机器设备，也从中国进口最终产品。

第一,在多种因素的驱动下,东部地区深度融入国际循环,并借助国际循环改变了中国区域间产业分工模式。众多研究证实,依赖国际循环(对外贸易和外商外资)的产业倾向分布于距离国外市场较近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国际循环的“吸引”之下,这些产业从空间上整体向国际市场发生“漂移”,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中心逐渐让位于“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的核心区域<sup>[18-20]</sup>。

第二,国际贸易引导着中国区域间贸易流量。中国省际之间的贸易模式同时具有内需和外需两种导向,即区域间贸易流量不仅受到国内贸易成本与国内市场规模的影响,也会受到外贸或全球经济循环的影响<sup>[21]</sup>。虽然从整体上看国内贸易仍然高于国际贸易、区域内贸易仍然高于区域间贸易,但由于地理区位优势不同,国际贸易对沿海地区影响更大,国内贸易则对中部、西北和西南区域更加重要<sup>[22]</sup>。

第三,对外贸易影响了区域间经济周期协同变化。各地区之间周期协同变化是考察国内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视角。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中国地区周期协同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特征,其中地区间对外开放差异阻滞了地区周期协同<sup>[23]</sup>。很显然,与内陆地区相比,沿海地区更多地参与了国际循环,因而也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更大的影响。

第四,从价值链的角度,国际循环重新塑造了沿海与内陆之间原来的价值链体系。如果将国内价值链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嵌套于全球价值链的国内价值链(第一类国内价值链)与基于内生能力、国内市场的国内价值链(第二类国内价值链),我们就会发现,对外贸易在带动沿海与内陆间第一类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沿海与内陆间第二类价值链分工<sup>[24]</sup>,使得中国地区间分工协作关系得以重构。特别地,外资进入不利于国内价值链深化,打击了国内价值链的上游环节,阻碍了内资企业的国内价值链攀升,也切断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上下游关联,从而影响了国内价值链分工的深化<sup>[25]</sup>。

### 三、内外循环之间依存互动

以上我们讨论了双循环相互融合的特征事实。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既要有主要依托于内需之上的产业体系,又要有足以吸收大部分产能的国内市场规模。然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放弃国际循环,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厘清各个地区参与双循环的激励,以找到政策“堵点”与“痛点”。

#### (一) 国际循环与区域分工整合的激励

从总体上看,人为地分割市场不利于发挥大国的规模效应,显然是不可取的,而当其他地区采取市场分割行动的条件下,排他性的干预又显然是有利的,这类似于“囚犯困境”中的两难选择<sup>[26]</sup>。那么,国际循环是如何影响各个地区参与市场整合的动机的?这里存在两个完全相反的趋向。对于要素与中间投入品市场来看,国际循环中的市场竞争需要国内区域内分工协作降低生产成本,形成国际竞争力,即国际循环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生产要素与中间品的贸易壁垒。对于产品市场而言,国际循环给各个地区提供了利用国际市场的机会,使得这些地区不必受限于国内区域间贸易,从而增强了各个地区分割市场的动机。这意味着,国际循环提高的市场机会将会诱发区域之间的“不合作”行为,这是决策者需要统筹考虑的重要方面<sup>①[27]</sup>。现实中,产品贸易与中间投入品贸易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从而国际循环对区域参与市场整合动机的影响也不确定。有研究显示,国际循环对国内区域间市场分割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开放程度较低的时候,对外开放会加剧国内市场分割,当开放程度较高的时候,对外开放又会促进国内生产整合<sup>[26]</sup>。

① 从跨国情况看,外部市场一体化造成了国内政治分离主义倾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之后许多国家内部族群矛盾凸显,那些文化、语言或种族上的少数族群不必依附其他大的经济体,可以从结成同质化政治实体中获益。

整体上,融入国际循环有助于促进区域间分工协作与市场整合。一方面,受WTO协议等的强有力约束,地方政府难以实施针对进口商品的保护主义行为,从而也难以实施发起其他地区的限制行为<sup>[28]</sup>,这就是“开放促进改革”的逻辑。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凭借国家不断扩大开放的制度承诺以及自身雄厚的技术、资本实力,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能够在全国各地区配置资源,因而能够消除地区间的贸易壁垒与要素流动的约束,促进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市场整合。

## (二) 区域分工整合与国际循环的参与激励

国际循环也受到地区经济规模的影响。在不变规模经济的世界中,进口与一国的需求规模或购买力成正比:市场规模越大,一国越有可能成为产品的净进口国。然而,考虑了规模经济之后,情况有可能完全不同。新贸易理论预测,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国内需求规模越大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净出口国,这就是“本地市场效应”。本地市场效应由Krugman给出正式的理论阐释,其核心逻辑是,给定规模经济和国家间存在贸易成本,则一国的需求规模越大,就越有利于该国企业降低成本和产品销售价格,从而获得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成本优势,表现为净出口而不是净进口该种产品<sup>[29]</sup>。根据这一理论预测,本国市场规模的变化方向与本国企业出口的关系相同:本地市场规模越大(增大),本国企业出口倾向越高(上升);本地市场规模越小(减少),本国企业的出口倾向越小(下降)。

区域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将国内市场划分为难以进入的多个“小市场”,迫使企业“走出去”<sup>[30]</sup>,企业要进入这些彼此分割的小市场将要付出一定的贸易成本。研究证实,地方保护主义形成了国内市场分割,不仅迫使众多企业“舍近求远”,转向国外市场<sup>[31]</sup>,对出口企业的产品国内附加值率也有显著的负面抑制作用<sup>[32]</sup>。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沿海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和发展壮大之前就已转向出口,难以上升为价值链的高端企业。

## (三) 内外循环的运行成本:生产率悖论背后的“秘密”

交易成本差异影响企业的行为,也影响了企业的绩效与成长路径。强调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预测,给定国外市场具有更高的贸易成本,生产率高的企业能够克服额外的这一贸易成本而出口,生产率低的企业则只能留在国内市场销售<sup>[33]</sup>。然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显示,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与这一预测完全相反。那些只供应国内市场的企业,其生产率反而高于供应国际市场的企业,即是否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随后的研究发现,不仅企业是否出口与生产率负相关,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大小也与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sup>[34-35]</sup>。早期的研究认为,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负向关系可能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主体<sup>[34]</sup>,即利用国际分工的成本要显著低于国内分工。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更多关于生产率悖论的来源,如行政垄断等<sup>[36]</sup>。无论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生产率悖论从一个视角说明,国外循环的成本低于国内循环。

除了区域间贸易壁垒与制度环境差异之外,增值税退税政策也是造成内外循环运行成本差异的重要来源:为了使得企业有一个公平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往往对企业的出口产品予以退税,对内销的产品则不予退税。中国的增值税长期保持在17%的水平上,如此高的税率差异将会导致企业市场选择行为的严重扭曲,也会导致企业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研究发现,增值税退税对出口金额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退税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出口金额上升至13%,或1.0美元的出口退税能够撬动4.7美元的对外出口<sup>[37]</sup>。

内外循环的运行成本差异还体现在要素市场上。中国一定程度上偏向性银行体系的选择性限制影响了作为内循环主体的国内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作为外循环主体的外资企业既有母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往往还能够根据信用状况和引资政策获得一定程度额外的信贷资金。不仅如此,国家对



进出口贸易设立了专门的金融扶持机构,但对于国内贸易缺乏足够的扶持措施。

## 四、内外循环、经济增长与 技术进步

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要求我们充分利用大国大市场优势改善分工体系,提高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双循环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

### (一) 市场需求与经济增长

市场规模的大小是发挥规模经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规模的重要性。他在该书的第一章就讨论分工对于生产效率的重要性,以“制针”为例,雄辩地指出,分工可以使得每个工匠专注某个特定操作,不仅能够增进技巧、减少工序转换成本,还能够发明和使用机器,从而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该书第三章又指出,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或机会的大小,即市场范围,如果市场范围狭小,一个人就不得不身兼多职:“散布在荒凉的苏格兰高地一带的人迹稀少的小乡村的农夫,不论是谁,也不能不为自己的家属兼充屠户、烙面师乃至酿酒人。在那种地方,要在二十哩内找到二个铁匠、木匠或泥水匠,也不容易。”<sup>①</sup>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或“市场范围假说”。市场规模能够提高生产率,具有重要的长期经济影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工提供了交换的机会,市场交换又促进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二者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正反馈”式的报酬递增过程<sup>[38]</sup>,这正是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增长过程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分工的细化与操作过程的简化,利用机器或专用工具等资本要素进行“迂回生产”不仅可能,而且很有必要。

斯密定理中的“市场范围”并无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之分,其中的市场机会也是分工的机遇。然

而,世界各国无一不是主权国家,在存在较高贸易成本或贸易限制的时代,一国的政治疆界决定了该国市场范围的大小,也决定了该国能够享有多少分工利益,这就是大国大市场的优势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运输和信息技术的下降尤其是政策性贸易壁垒的下降,各国可以自由地相互贸易,可以借助世界市场克服国内购买力的不足。全球化时代,许多小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快速崛起,并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这也表明,世界市场带来的潜在贸易利益足以克服报酬递减规律,成为助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近代世界史见证了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经济体相继崛起为“海上霸主”,亚洲“四小龙”借助外向型经济快速增长并被誉为“东亚奇迹”。

根据斯密定理,贸易开放将会削弱一国初始经济规模与后续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sup>[27,39]</sup>,即国际循环将会减弱国内循环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增长不必受限于本国或本地市场。现有研究证实,本地市场规模与国外市场规模(或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两个市场的作用也是相互替代的<sup>②[12,40]</sup>。由于产业之间存在不同的市场依赖属性,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分别通过各个产业对这两类市场的不同依赖特征影响产业的增长速度。在出口比重较高从而国外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依赖国外需求的产业增长较快;在本地和地区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依赖国内需求的产业增长也较快<sup>[41]</sup>。制度松绑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能够“走出去”,将低收入和低工资的“贫穷”转换成了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优势,从而内资企业有机会借道外循环实现转型并迅速成长。总体上,融入国际循环给封闭循环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经济体能够接力“四小龙”,延续了东亚增长的奇迹。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页。

② Ades 和 Glaeser 以 20 世纪欠发达国家和 19 世纪的美国各州的经验研究, Alesina 等以 1960~1989 年 120 多个国家样本的研究,结论均支持了这一判断。

## (二)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

外商直接投资从资本、技术等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站在中国即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点,日本和“四小龙”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工业体系逐渐完善,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由于空间和人口规模较小,工资和地价快速上升,正亟待降低成本,自然把眼光转向“穷则思变”的中国,尤其是交通便利、产业配套齐全同时具有多种政策优惠的中国沿海。跨国公司能够在不触动国内循环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设立合资企业等形式实现产业转移,将东部地区成功“带入”国际循环。

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外汇、资本、技术供求缺口扩大,“以产顶进”、鼓励合资企业等政策相继实施<sup>[42]</sup>。这使得外循环“带宽”不断变大,从产品、资金、技术、人才等多个层面向内循环渗透。通过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外资企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优化与增长转型的有力推动者。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随着“为出口而进口”过程的推进,部分国内企业看到了市场机遇,转而成为出口企业生产零部件。通过吸引企业间接参与国际循环,贸易自由化一方面降低了国产中间产品的价格,使得外资企业转向本地采购而不是进口即供应链本地化,这在总体上提高了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例,另一方面也给国内企业提供了一个通过学习消化进而“进口替代”的平台,加速了本土企业的成长,以及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的完善。如 kee et al.<sup>[43]</sup> 的研究发现,从 2000 ~ 2007 年间加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比例从 65% 提高到 70%,提高了 5 个百分点。

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内外循环“咬合”力度大大增强,跨国资本也逐渐从简单的“出口平台型”投资向“国内市场寻求型”投资转型,从垂直型投资向水平型投资转型,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产业链体系日臻完善,抵抗外部风险与冲击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民营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率水平不断增强,部分企业成为对外

投资的主体和“走出去”的中坚力量,这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

## 五、结语

以上我们梳理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互为表里,是客观认识中国经济现实的重要视角。贸易自由化与国内贸易成本决定了改革开放后各地区与企业参与双循环的程度。双循环彼此融入,共同塑造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市场整合格局,彼此依存互动,影响了企业的行为与绩效,也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市场机会、要素与技术。

当前,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较低,大量高科技产业的企业处于依附地位,没有定价权和议价能力,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或“中低端”,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有利于各地区优势互补的国内循环体系。这既无法提供足够的市场以消化产能,也无法提供有效的产业配套以提升国际分工价值。换言之,中国经济目前高度依赖国际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形成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和大企业脱颖而出从而能够提升其国际竞争合力的国内循环。身处这样一个国内分工体系,其宏观上的外在表现就是内需不足,从而不得不高度依赖欧美市场消化产能,货物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在微观上,中国(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在没有充分发育之前就需要出口,一定程度上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较难进一步发展关键技术和自主品牌,主要依赖廉价要素投入和价格竞争。

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互相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总体目标归结起来就是要在需求上形成消除各种区域间贸易壁垒,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在供给上形成区域间分工协作、整体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内供应链体系;在微观上形成灵活的、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和大企业脱颖而出的企业生态。目前,中国经济的循环基本情况是,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并行不悖,既有彼此融合又相互分离,而“形成这一状况的政策法规虽然历经调整,但

依然有效”<sup>[42]</sup>。长期来看,我们必须进一步对内、对外扩大开放,改善国内地区间和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形成统一、高效、灵活的国内循环系统,使中国逐步摆脱目前这种依附型国际分工地位和低附加值的价值链地位,才能最终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循环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参考文献:

- [1] James A E, Wincoop E V. Trade cost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42(3): 691-751.
- [2] Ling F, Li Z Y, Swenson D L.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1(4): 86-101.
- [3] 钱学锋, 梁琦. 测度中国与 G-7 的双边贸易成本——一个改进引力模型方法的应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2): 54-63.
- [4] 李坤望, 黄玖立. 中国贸易开放度的经验分析: 以制造业为例[J]. 世界经济, 2006(8): 11-22, 96.
- [5] 黄玖立, 周璇. 定制化与地方保护主义: 经验证据及对自贸区建设的启示[J]. 管理世界, 2018, 34(12): 56-66.
- [6] 黄玖立, 徐旻鸿. 境内运输成本与中国的地区出口模式[J]. 世界经济, 2012, 35(1): 58-77.
- [7] 白重恩, 冀东星. 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 来自中国国道主干线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18, 41(1): 101-122.
- [8] 逯建, 施炳展. 中国的内陆离海有多远: 基于各省对外贸易规模差异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14, 37(3): 32-55.
- [9] 张光南, 宋冉. 中国交通对“中国制造”的要素投入影响研究[J]. 经济研究, 2013, 48(7): 63-75.
- [10] Snow N B, Brandt L, Henderson J V, et al. Roads, railroads,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Chinese citie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7, 99(3): 435-448.
- [11] Faber B. Trade integra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 trunk highway system[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4, 81(3): 1046-1070.
- [12] 黄玖立, 李坤望. 对外贸易、地方保护和中国的产业布局[J]. 经济学(季刊), 2006, 5(2): 733-760.
- [13] Bai J, Liu J H. The impact of intranational trade barriers on exports: evidence from a nationwide VAT rebate reform in China[EB/OL]. (2019-11-01)[2020-12-20].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6581/w26581.pdf](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6581/w26581.pdf).
- [14] Sylvie D, Sachs J D, Woo W T.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location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nd having the right incentive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 444-465.
- [15] 黄玖立, 吴敏, 包群. 经济特区、契约制度与比较优势[J]. 管理世界, 2013(11): 28-38.
- [16] 林毅夫, 刘明兴.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 世界经济, 2003(8): 3-14, 80.
- [17] 李坤望, 王永进. 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0, 9(3): 1007-1028.
- [18] 黄玖立, 李坤望. 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06(6): 27-38.
- [19] 冼国明, 文东伟. FDI、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J]. 管理世界, 2006(12): 18-31.
- [20] Ying G.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3): 550-559.
- [21] 徐现祥, 李郁. 中国省际贸易模式: 基于铁路货运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12, 35(9): 41-60.
- [22] 李自若, 夏晓华, 黄桂田. 中国省际贸易流量再估算与贸易演变特征研究[J]. 统计研究, 2020, 37(8): 35-49.
- [23] 黄玖立, 李坤望, 黎德福. 中国地区实际经济周期的协同性[J]. 世界经济, 2011, 34(9): 19-41.
- [24] 黎峰. 进口贸易、本土关联与国内价值链重塑[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9): 25-43.
- [25] 黎峰.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内价值链分工?[J]. 财经研究, 2017, 43(11): 70-83.
- [26] 陈敏, 桂琦寒, 陆铭, 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发挥规模效应? ——经济开放与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08, 7(1): 125-150.
- [27] Alberto A, Spolaore E, Wacziarg R.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5): 1276-1296.

- [28] 李杰,孙群燕.从啤酒市场整合程度看 WTO 对消除地方保护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6):37-45,80.
- [29] 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5):950-959.
- [30] 朱希伟,金祥荣,罗德明.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J].经济研究,2005(12):68-76.
- [31] 张杰,张培丽,黄泰岩.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J].经济研究,2010,45(8):29-41.
- [32] 吕越,盛斌,吕云龙.中国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5):5-23.
- [33]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 [34] 李春顶,尹翔硕.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J].财贸经济,2009(11):84-90,111,137.
- [35] 李春顶.中国出口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检验[J].世界经济,2010(7):64-81.
- [36] 盛丹.地区行政垄断与我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J].产业经济研究,2013(4):70-80.
- [37] Chandra P,Long C. VAT rebates and export performance in China:firm-level evidenc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3,102:13-22.
- [38] Young A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J]. Economic Journal,1928,38:527-542.
- [39] Alberto A, Glaeser E. Evidence on growth,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3):1025-1045.
- [40] 盛斌,毛其淋.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级经济增长:1985 ~ 2008 年[J].世界经济,2011(11):44-66.
- [41] 黄玖立,黄俊立.市场规模与中国省区的产业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8,7(4):1317-1334.
- [42] 马晓野.经济内外循环形成的历史、现状和政策转向 [EB/OL]. (2020-09-29) [2020-12-1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929/22/69655530\\_938226040.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929/22/69655530_938226040.shtml).
- [43] Kee H L, Tang H.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6,106(6):1402-1436.

(责任编辑:王佳)